

戏剧家传论丛书

汤显祖传

锡 文 著
黄 凤 书



● 戏剧家传论丛书 ●

汤显祖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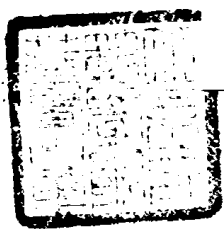
黄文锡 吴凤雏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6035



1086035

汤显祖传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字数17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4}$ 插页2

198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700册

书号: 8069·853 定价: 1.30元

引 言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海若士，一称若士，自署清远道人，晚年自号茧翁。江西临川人。我国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进步的思想家和卓越的反封建斗士。

汤显祖生活在明代中、晚期，身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呈现出种种末期症状：社会腐朽黑暗，人民苦不堪言，各种矛盾交并激化，朱明王朝已濒临“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①的垂死境地。

在明代，由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疯狂掠夺与兼并，导致土地的高度集中。皇帝本人占有大量的庄园，据孝宗时统计，已达到全国私田总数的七分之一。诸王、勋戚、宦官所占有的庄田，往往也在万顷以上。大官僚和一般地主都贪婪地掠夺、兼并土地。如世宗时的首辅徐阶，占田竟达二十四万亩。神宗时，在江南的大地主中，有的占田至七万亩。太湖流域，有田产者在人口总数中仅只十分之一，而佃农却占十分之九。

① 吕坤《去伪斋集》卷五《答孙月峰》

与土地高度集中相一致的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一切权力归皇帝。皇帝、后妃一般都宠信宦官，而宦官头子又可以决定内阁首辅的人选。这样，明代中、晚期的朝政，就形成一个由皇帝、后妃、宦官、首辅所组成的最高权力中心。在这种制度下，君臣关系一如主仆，官僚机构冗杂瘫痪。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仅召见大臣一次。神宗皇帝朱翊钧在万历十七年以后的三十年中间，也只召见过大臣一次。首辅倚恃着皇帝和宫廷的势力，专擅权柄，党同伐异，凡有臣僚逆意，言官劝谏，轻则贬官流放，重则监禁杀头。汤显祖就因上疏揭露弊政，被贬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去了。在明代中、晚期，宦官直接干预政事，实行残暴的特务统治。明末宦官总数达十万人，在宫中掌有十二监二十四个衙门，主持锦衣卫，东、西厂等特务机关，侦察和监视朝臣的活动，刑讯、处决异己和叛逆者，其手段至为残毒。权贵们常受皇帝的“恩荫”，其子孙尚在襁褓之中，就能得到爵禄封赠。明代的科举考试，往往成了达官显贵行使“后门”特权的良机，并能得到皇帝的默许。万历时，首辅张居正就公然让自己的儿子中了“关节状元”，使汤显祖成为科举中的受害者。

明代帝王权贵的生活，奢华无度，糜烂透顶。正德皇帝朱厚照，惯于演出“游龙戏凤”的丑剧，四出闲逛，奸淫民妇，所经之地，竟至于“民间汹汹，有女者一夕皆适人”^①。其后之明代皇帝，无不贪嗜金帛珠宝，在宫廷之

^① 《明通鉴》卷四十八

下设立了“针工”、“内织染”等“八局”，织造各种龙衣章服，供官中服着及赏赐之用。到万历时，每年的织造定额已增至十五万匹。嘉靖皇帝有一年下令采集珍珠，“死者五十余人，而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之‘以人易珠’。”^①当时，国库存银不足十万两，财政亏额高达一百四十余万两，而嘉靖仍奢华如故，仅为他烹调御膳的厨工，就多达五千六百余人；御苑养豹一只，用役二百多人，占地十顷，每年支粮二千八百石。万历时，更下令开金矿，设税监，派遣宦官四出掠夺，“大珰小监，纵拱绹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②皇上如此，其所宠信的宦官权臣又如何呢？正德年间，宦官头子刘瑾在其死后抄家时，获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余万两。嘉靖时的奸相严嵩同样贪酷，当时朝廷积储，不支边防军一年之费，而严嵩一年所储竟可支数年；死后抄家，亦获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珍宝无数。

对比之下，广大人民的生活却陷于极端的贫困之中。苏州一府的官田，每亩租额高达一般田赋的八倍。河南地区高利贷利率高到加三、加五。兼之旱、涝天灾不断，农民或弃田逃亡，或卖儿鬻女。嘉靖时，福建贫民卖一子

①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

② 《明史·陈增传》

女，所得谷物不过数斗。山西百余里不闻鸡声，饥极之时，竟至父子夫妻相易而食，称为“人市”。残酷的剥削，激起人民的反抗，自成祖时山东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到神宗时浙江赵一平扯旗造反，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为了禁锢麻痹人民的思想 and 斗志，朱明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鼓吹以孔子为神圣，以儒学为正宗，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二程宣扬“君臣父子，天下定理”，“君德即天德”^①；朱熹进一步发挥：“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② 人民大众的生存欲求，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由理想，都被视为万恶的“人欲”，大呼什么“天理存，则人欲亡”^③。读书士子，被限定只读朱熹等所注的“四书五经”。科举考试，被勒令只作拟古释经、不得自由发挥思想的“八股文”。

风雨如磐，妇女压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成祖时，仁教皇后亲撰《内训》，“颁赐”臣民；又辑《古今列女传》，由成祖作序，刊布天下。在汤显祖所生活的时代，神宗之妃郑氏又为《闺苑图说》一书作序，广为发行。《明史》所收之“节妇烈女”多达三百零八人，为历代史书所罕见。因殉节而死，“著于实录及都邑志者，不下万

① 《二程遗书·语录》

② 《朱子语类》

③ 《朱子语类》

人”^①。

由于统治者的祈求长生，社会出路的重重阻塞，人民的苦难无方解脱，导致了佛道思想的泛滥。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士大夫乃至民间，言佛佞道，靡然成风。嘉靖皇帝大建斋醮于宫内，诏方士献淫乱无度的“采战”术。他一味追求“不死之药”，却被“伪造诸品仙方”送掉了老命。万历皇帝同样迷信道教，沉湎酒色。在此种风气之下，就连当时号称能臣良将的张居正、戚继光、谭纶等人，都未能免于斋醮、“采战”之道。而士大夫热中于求仙慕道的情景，也大有魏晋遗风复萌之概。汤显祖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曾冲破过重重的封建藩篱，却毕生挣不脱“仙游”思想对他的制约，足见此种影响在当时之深入社会人心。

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酿成了文学艺术中扼制创作生机的复古倾向。

在文学方面，明初上层官僚间形成一种“台阁体”，它专事追求形式的典雅工丽，在内容上则一味粉饰太平，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其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相继迭起，他们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相互标榜，皆以复古摹拟为其能事。

在戏曲领域，统治者严禁《西厢》、《水浒》等所谓

^① 《明史·列女传序》

“海淫海盗”之作。《大明律》一面规定艺伶不许搬演“历代帝王后妃”，以示皇家尊严之不可触犯；一面又申明“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①，以便按封建道德的规范对人民实行精神统治。御用文人邱濬所作的《五伦全备记》传奇，开宗明义就宣告了“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的宗旨。邵璨所作的《香囊记》，竟陈腐到以八股文入曲，对此，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曾用“最为害事”一语加以抨击。

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方面的封建统治，像浓密的阴霾，窒息着神州大地。而在朱明王朝半已腐溃的土壤中，却已朦胧地呈现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星星葱绿。

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基础是手工业生产。我国的手工业，到了明代中、晚期，已具备农村家庭手工业、民间小手工业作坊、官营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四种生产方式。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中心：如苏州是丝织业中心；松江是棉织业中心；景德镇是陶瓷业中心；遵化是炼铁中心等等。此外，军工、造船和新兴的玻璃制造业也都日渐兴盛。工场主靠剥削手工业工人的剩余价值致富，如万历间的吏部尚书张瀚，曾自述其先祖于成化末年“购（织）机一张，织诸色紵布，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

① 《大明律讲解》卷二十六《刑律杂犯·禁止搬做杂剧律令》

继之，备富至数万金”，^①这不啻是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一本发家史。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的货币出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白银作为货币普遍流通，农产品也逐渐趋于商品化。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对农民的剥削采取了货币地租的形态。破产的农民，很大一部分流入城市，转变为手工业工人。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些迹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市民等级”的趋于成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作为“非常古老的观念”的人的“共同点”，就在于要求“平等”，而“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资产阶级，正是由这个等级中“破茧而出”的。在汤显祖的时代，由于市民等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日益加深，已酿成了此伏彼起的“市民运动”。万历间，汉口、襄阳、湘潭各地都爆发过这种运动。云南的反矿税运动，参加者达万人。江西景德镇和上饶的市民，也进行了反矿税的暴力斗争。

正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市民等级”的成熟和“市民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深刻变革。

明代中、晚期，在哲学上是一个思考的时代。尽管程

^① 《松窗梦语》卷七《异闻记》

朱理学力图一统天下，一些新的学派还是不断脱颖而出。泰州学派的出现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这是从对王阳明的“心学”进行变革而产生出来的一个学派。由于“心学”并未从根本上否定程朱理学，泰州学派从它的创始人王艮至其三传弟子、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也只是企图以主观唯心主义去修正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然而他们的理论却具有两重性。其中富有进步意义的是“百姓日用是道”^①和“制欲非体仁”^②这样两个著名的论点。程朱理学把“道”说得非常神秘，认为它只能通过“圣经贤传”的途径来传布，只有向“外”用功才能修得，所以“道”的绝对性和孔、孟的至圣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而泰州学派却把人的道德观念都视作“不费些子气力”就可修得的东西，鼓吹“百姓日用是道”，“满街人都是圣人”^③，论道应“不求诸古，只求诸今；不求诸圣，只求诸愚”^④，这就否定了程朱理学所谓“道”的绝对性，摇撼着“至圣”的统治地位和封建道德的规范。程朱理学主张消灭“人欲”，泰州学派却鼓吹“制欲非体仁”。这里的“欲”，概括着人的物质欲求和精神欲求，当然也就可以被引申为百姓的生存权利。这就与维护封建统治而剥夺广大人民生存权利的复“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发生对峙，因而引起了封建卫道家们的极大恐慌，受到了

①③ 《王艮年谱》，转引自杨天石《泰州学派》

②④ 罗汝芳《近溪子集》册三、册六

他们所谓“荡轶礼法，蔑视伦常”而“百病交作”^①的攻击。为汤显祖所继承的泰州学派的那些哲学理论的进步性，正是当时“市民等级”所憧憬的，作为人的“共同点”的“平等”观念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翻新和阐释，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产物。

当时更加激进的是启蒙思想家李贽的哲学理论。他的理论，与泰州学派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卓越的民主战士，他高举反封建的旗帜，向程朱理学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在政治上戳穿了“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②的封建正统道学家的本质；在道德观上反对封建礼教而主张“穿衣吃饭都是人伦物理”^③；在人性论上认定“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既说以人治人，则条教禁约，皆不必用”，而应“各以所好，各聘所长”，以保持“未雕未琢”的“自然之性”^④。激烈的反封建的理论，使李贽成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思想界最杰出的代表。

泰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与达摩菩提教的禅宗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禅宗大师真可（达观），自身存在着“出世”与“入世”的思想矛盾。为阻止封建统治者的采矿征税，他到处奔走呼吁，宣称“矿税不止，则我

①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二《学术辨》

②③④ 李贽《焚书》

救世一大负”^①。他和李贽先后被统治者拘捕入狱，受迫害致死。汤显祖对他们都十分敬仰，自称“见以可上人（达观）之雄，听以李百泉（李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②。

我国文学艺术历史的优秀传统，即民主精神、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到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市民运动的发展，更使两宋以来逐渐形成的“市民文学”日臻繁荣。在汤显祖时代，由冯梦龙编定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创作、编辑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都是“市民文学”的典型作品。同时出现的《金瓶梅词话》，揭露了明代社会黑幕和官商恶霸的荒淫残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封建禁欲主义的一种惩罚。晚明文坛上，言“情”成风，人欲横流，显然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文学理论上，以袁宏道等为首的“公安派”，高举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摹拟主张的大旗，鼓吹文学要抒写性灵，崇尚自然，为突破程朱理学对文学创作的束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一阶段，戏曲艺术也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大明律》虽禁止“搬做杂剧”，却束缚不了戏曲在民间

① 《紫柏老人集》卷首，憨山《达观大师塔铭》

② 尺牍《答管东溟》

的蓬勃发展。中国戏曲史上著名的弋阳、崑山、余姚、海盐“四大声腔”，都在汤显祖的时代并峙鼎盛。海盐腔由谭纶率先传布到江西，成了汤显祖传奇创作中曲词格律的依凭。文人创作传奇之风日盛，大多以此自命风雅，炫耀才学，这与元杂剧时代“书会才人”们靠写戏谋生的情景大不相同。它使得文人的传奇创作产生了“台上之曲”和“案头之书”的分野。就传奇创作的思想内容看，到明代中、晚期，富有人民性的作品迭相出现，它们违反了《五伦全备记》一类剧作“备我圣贤言”的宗旨，批判封建统治阶级，为平民百姓倾吐心声。《鸣凤记》痛斥了严嵩的专权误国。《精忠记》通过鞭挞奸臣秦桧而表现出现实的政治意义。明末李玉的《精忠谱》和《万民安》，更是两部直接受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而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杰出的“现代戏”。前者反映了天启六年由商人发动的反对宦官头子魏忠贤的斗争，后者描写了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纺织工人葛贤领导的反对税监孙隆的市民运动。不少爱情题材的传奇，也能在大胆言“情”的同时，追求着重大的社会意义。王玉峰的《焚香记》，为负心汉王魁开脱，却转而把矛头指向迫害妓女的富豪。汤显祖盛赞此剧“所奇者，妓女有心”，“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①。高濂的《玉簪记》，讴歌了女尼陈妙常追求爱情自由的故事，更是一种胆大妄为的离经叛道。周朝俊的《红梅记》，不但揭露了

① 《〈焚香记〉总评》

权奸贾似道的荒淫残暴，也是成功的言“情”之作，汤显祖称赞它“境界纤回宛转，绝处逢生，极尽剧场之变”^①。这些都是戏曲史上的瑰丽篇章。

放眼世界文坛，明代中、晚期正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关系已在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诞生，在文化上开始反映这一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从而出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潮。从意大利的但丁、卜伽丘、达·芬奇到英国的莎士比亚，都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出反对封建宗法、反对禁欲主义和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倾向。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所提出的“乌托邦”理想，更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回头再看明代中、晚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不使我们惊异于东西方国家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步伐的大体相似。当然，这同中国自唐、宋以来一直与世界各国进行通商和开展文化、科学上的交流有关。明代中、晚期，并不象后来满清王朝那样“闭关锁国”。明初永乐年间郑和的七下西洋，就是中国国际关系史上的壮举。明武宗年间，由葡萄牙人发难的欧洲商业资本的入侵，以及西班牙、荷兰、英国的接踵而至，一方面困扰着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由此输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使中国，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

① 《红梅记总评》

同时，也培养了象徐光启这样学贯中西的科学家。汤显祖与利玛窦有过会晤，并在诗文中写过他留下的印象。东西方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的起步虽然在时间上大体相近，但由于彼此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的不同，其后的发展状况便表现出极大的悬殊。在汤显祖时代，临近末路的封建势力仍相当强大，相形之下，资本主义萌芽就显得稚弱了。由于资产阶级尚未出现，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也还没有形成，因而汤显祖和当时其他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所依循的哲学、政治思想体系，仍不能超脱儒学的范畴，其思维的语言也仍然还是传统的“中国方式”的。当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必然会带来许多变化和改革。这样，一些作家的思想和作品，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初期的作家和作品，就存在某些共同特征。

《金瓶梅词话》与卜伽丘的《十日谈》，就有其异曲同工之妙；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与莎士比亚的剧作，也各自代表着同一时期东西方戏剧文化的光辉成就，两峰并峙地屹立于世界的文坛。

从上面的背景介绍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明代的中、晚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不寻常的时代。这时，反动与进步、腐败与新生处在剧烈的搏斗之中，社会在动荡，思想在分化，生活在变迁，这诸多的时代特征，几乎都在汤显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其历经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和痛苦的徬徨求索之后，终于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敏锐而勇敢地站到了时代的

前列。综观他一生的言行及其剧作诗文，对于黑暗腐朽的封建势力，从首辅权臣的专横暴戾、宦官酷吏的贪赃枉法直到皇帝的荒淫昏聩；从抑贤祸国的科举制、“恩荫”制直到堂而皇之的《大明律》；从残害女性的《昔氏贤文》，荒谬迷信的佛道方术，尔虞我诈的世俗风尚直到毒害整个社会的程朱理学；从一味追求形式的“格律派”戏曲直到鼓吹复古摹拟的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他都进行了勇敢的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他更表现了自己对祖国的执着的热爱和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于新生事物，他总是满怀热诚，如饥如渴地从中汲取新鲜的乳汁。他倾心于具有进步倾向的泰州学派，毫不迟疑地站在思想斗士李贽的一边；与他视之为“侠”的达观禅师有着“救世”的共同语言；与遭受迫害的东林党人和一切正直清廉的官吏相默契相激励；他同情市民等级的市民运动；赞扬并支持一切富有生气的，倾向进步的文艺作品；他弃浊扬清，博采兼蓄，千锤百炼，熔于一炉，终于将自己造就成为一位思想先进、学识渊博、艺术造诣极高的、为后人永远怀念的伟大的戏剧家。正如陆稼在《玉茗堂词记》中所说：“夫先生一人尔，始焉学道，居然大鸿也；继而慷慨，又为直节名臣矣；晚乃漱润词场，以风流擅名当代。”他毕生在坎坷中的努力奋斗，终于使自己在戏曲以及诗文的创作中，获得了巨大的多方面的成就。这本小册子，只能去繁就简，力求比较全面而又扼要地介绍他一生的作为和业绩。